

# 創作學以致用

8

甘肃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周总理谈文艺 .....	( 1 )
创作、欣尝与认识 .....	王朝闻 ( 30 )
关于长篇小说 .....	孙 犁 ( 45 )
关于中篇小说 .....	孙 犁 ( 55 )
谈短篇小说 .....	艾 莞 ( 61 )
徐迟同志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的报告 .....	( 68 )
附三篇古文 .....	( 95 )
报告文学选：	
哥德巴赫猜想 .....	徐 迟 ( 98 )
探访“数学怪人” 陈景润 .....	秦 牧 ( 130 )
两个年轻人的故事 .....	李 准 ( 138 )

# 周总理谈文艺

一、周总理教导我们：文艺工作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指示我们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一九四五年十月，冼星海同志不幸逝世。毛主席为他的追悼会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一个重要讲话中热情肯定了聂耳同志。周总理称他们两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一九三九年，周总理为冼星海亲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研究室：《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破产》，  
《人民音乐》1977年第2期。

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一到武汉，就对有关组织和团体指出要作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周总理还亲自作了一系列部署。如武汉当时聚集了本地和外地来的一千多名演员，周总理指示将他们组织起来，学习爱国主义精神，为抗战服务，编写抗战戏，为抗日战士演出。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周总理亲自在邦可花园茶座召开会议，给文艺工作者介绍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文艺要为抗日救国出力，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当作战场。并且指出如果敌人占领武汉，

就向后方撤退，决不替敌人歌舞升平。深刻的指示，谆谆的教诲，使每一个与会者极为感动。

——何仲勉：《抗日时期周总理在武汉》，《湖北文艺》1977年第2期。

周恩来同志对《屈原》剧本，反复阅读，也曾到剧场看过几次排练，对“雷电颂”（注：《屈原》剧中的一段独白）很欣赏。他曾笑着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忿，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忿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周恩来同志为了使这段戏充满更强烈的时代感情和政治效果，叫我把两个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念“雷电颂”给他听，反复念了好几次然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我们的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

——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一九四五年，我们到了东北，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开辟了第一个基地，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是今天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我们拍摄了《民主东北》，送到关内，请中央审查。总理亲自看了这些片子，特地拍电报鼓励我们，同时指示我们要用电影来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服务。

——徐肖冰：《周总理对新闻电影事业的培育》，《人民电影》1977年第5、6期。

多年来，总理只要见到我们，总要向我们提出深入工农兵的问题，告诫我们只有深入地体验了生活，才会出现有生命的东西。十几年来，凡是我们真正有了深入的生活体验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总是得到总理的肯定。为了让我们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经受锻炼，总理亲自为我们创造深入生活的条件。如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发表以后，我们贴出了大字报，要求把戏送到福建前线去，慰问亲人解放军并锻炼自己。总理来看我们的演出，看见了我们的大字报，两天后就传来了消息，总理批准了！于是，我们和兄弟团体一起，一直把戏送到了大登岛的前沿阵地。

——任毅：《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教诲 坚持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光明日报》1978年3月3日。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的好总理呵，紧跟毛主席，亲笔题词，提出了学习雷锋的具体内容，还亲自在北京文艺界联欢会上，向革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一个战斗号令：拿起笔来写雷锋。

我们团为完成周总理提出的战斗任务，用很短的时间创作并赶排了六场话剧《雷锋》。

——沈阳部队政治部话剧团：《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怀念您》，《辽宁日报》1977年1月15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象在上海看《第二个春天》一样，周总理又邀请文艺界人士看了《霓裳》剧，并亲自主持了座谈会。会上，周总理对一些领导同志和知名人士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有人说现代戏不好写么？他们不是写出来了么？接着，总理针对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严肃地说：不反对

修正主义，我们社会主义阵地不巩固，擂台要天天打。要把队伍整顿一下，把作家动员起来，多写些现代的东西，不要光写古人死人啰！

——漠雁：《周总理领导我们写现代戏》，《解放军报》1978年  
2月24日。

一九五八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戏演完了，深夜了，周总理还是象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来到后台……在场的每一个同志几乎都能聆听到他的亲切教诲：“过去在延安看过你们的戏，延安的精神不能忘啊！”“抗战时期在重庆搞戏多艰难，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老在城里演了，你们应该马上下去，到农村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现在农村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你们应该去，应该马上上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我们衷心地接受总理的批评，齐声回答：“总理！我们马上就下去，到农村去！”总理非常高兴，爽朗地笑了。……夜更深了，……我们簇拥在他的周围送他上车时，他手扶着车门还回过头来谆谆嘱咐我们：送给你们八个字“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要搞出反映现实斗争的好作品来，只要你们努力反映现实斗争，哪怕就是搞出一个活报剧，我也要看的！

——杨宗镜：《话剧演员的怀念》，《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一九六四年，百忙中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和首都其他文艺单位的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亲切的对大家说：你们要搞好“三化”：一是搞好革命化，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做好文艺工作；二

是搞好民族化，要注意发扬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风格；三是搞好大众化，要全心全意面向工农兵。周总理的亲切教导给了文艺战士巨大的鼓舞。

——本报记者：《学习周总理 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解放军报》1977年1月15日。

作者深入生活，有的能很快写出作品，有的不一定。作家们回忆起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问题曾经作过这样指示：“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大家觉得很重要。只有长期深入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觉得有话要说，有人物要支持，才能写出比较好的作品。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9日。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看过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出后，接见了我们，说：“四川有一剧团用骡子驮着道具常年在农村，你们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多么难忘呵！总理在教育我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刘师良：《深情的怀念》，《黑龙江日报》1977年1月17日。

我们鄂托克旗乌兰牧骑，自从一九五九年建队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四次亲切接见了我队的代表，敬爱的周总理先后八次亲切接见了我队队员，并且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一九七四年周总理在病中，还亲切询问了乌兰牧骑的情况，关怀着乌兰牧骑的成长。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我们内蒙古乌兰牧骑的代表到北

京，为庆祝国庆十六周年进行演出。……周总理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请我们内蒙古乌兰牧骑的代表吃饭。总理和我们围在一个圆桌旁边和我们交谈了四十分钟。

总理首先热烈祝贺我们说：你们内蒙古乌兰牧骑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为你们祝贺。你们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和《讲话》，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使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为我们文艺革命指出了明确方向。

总理接着问我们：内蒙古现在不是光骑马吧？火车、汽车还有吧，有没有？我们回答说：“有。”总理说：“我建议，你们还得骑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乌兰牧骑，把马骑上，把帐篷驮上，比较好。到了城市，不要忘了乡村，不要忘了牧区，不要忘了过去，不要忘了骑马。”一席话说得我们热乎乎的。

当询问了我们在全国巡回演出的情况后，总理说：你们才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希望你们乌兰牧骑永不生锈，永保自己的荣誉，把革命的歌曲、舞蹈、音乐，在全国传播。你们应把这一把火点到全国，搞好文艺革命，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备战备荒为人民。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你们还要提高。你们内蒙古乌兰牧骑这么大的干劲，十几个人一个队，真好啊！你们人少，服装道具轻便，在农村牧区下去花不了几个钱。你们是艰苦朴素的，你们要发扬这个精神，因此，我今天吃饭时，专门准备了大锅饭，这是对你们尊重，我们向你们学习，今天我吃窝头就是向你们学习。总理还谆谆告诫我们：“你们不要骄傲，骄傲是危险

的。你们不要翘尾巴，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要谦虚谨慎。”……

当回答了总理问我们会几种乐器后，总理高兴地说：你们这是一专多能呀！一专多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比如蒙古民族就是这样，自拉自唱，多好哇！总理还一再嘱咐我们把三分之二的时间拿出来到基层演出。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在多年下乡演出中，深深体会到，深入工农牧兵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道路，贫下中牧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贫下中牧的教育下，我们为贫下中牧献歌献舞更加自觉了。

——乌兰牧骑鄂托克旗：《周总理的谆谆教诲永远鼓舞我们前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六二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日子，歌剧《白毛女》又一次公演了。那一天，总理又来看我们的戏。说来惭愧啊，我们只见总理从一楼走到二楼，又从二楼走到三楼，在每个不同的位置上都坐了一会儿。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事后才听到了总理的批评。原来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管弦乐队上出了问题。总理说：“台上的演唱听不真切，开始还以为是剧场建筑上的问题，结果发现是乐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筑起了一堵‘音墙’。”总理严肃地说：“如果让大管弦乐队把演员和观众隔开，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我们接受总理的批评，调整了乐队的编制。

——王昆：《周总理鼓励我为人民歌唱》，《人民音乐》1977年第2期。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学院校庆十周年，周总理在百忙中来到学院，与师生员工共度校庆。总理针对当时艺术教育中存在的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指出话剧教育要自力更生，不要硬搬外国的经验，对外国的经验也要分析，话剧要有民族风格。同时再次指示我们一定要到工农兵中去。总理风趣地指着四楼礼堂说，你们这个礼堂确实很小，可以走出去嘛！总理还勉励师生，要关心党的事业，要努力为人民多作一些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中央戏剧学院：《艺园蓓蕾 总理浇灌》，《艺术教育战线》  
1977年第1期。

对于反映工农兵生活、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作品，周总理总是倍加爱护，细心扶植。在我拍摄《春满人间》的时候，总理热情地肯定了电影反映大跃进时代的特点。他说：“我们的电影要反映新人新事、新的英雄，这样才有生命力。在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都不用怕。拍这个戏的缺点，在拍下一个戏的时候，就可以注意避免而有所改进。”他明确地说：“只要是反映新时代、新社会的电影，我全力支持。”

——白杨：《欢腾时节思总理》，《解放日报》1978年3月  
12日。

一九五三年，我们在北京演出历史剧《屈原》。我们在总理家中谈到了这个戏。这个戏抗战时期在重庆上演过。总理对我说：一个戏的演出，要看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更有教育意义。你们那时候演出，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抗日、真投降的嘴脸，有很大意义，

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比起今天来，更有价值。他教育我们时刻记住在今天文艺要更好地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社会。

一九五八年，周总理来上海时，我正在演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总理看过后，就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多演一些反映当代伟大斗争的戏，要不失时机地反映这种生活。”

——秦怡：《周总理恩情暖人心》，《解放日报》1978年3月10日。

“只要你们努力反映现实斗争，哪怕就是搞出一个活报剧，我也要看的。”周总理的嘱咐，说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多热呵！

——中国话剧院：《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戏剧》1977年第1期。

一九五六年，我随长春市话剧团在北京演出期间，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总理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演出。以后还要多写些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小戏，这种艺术形式，反映政治形势方便、迅速……。”

……当总理听我汇报说我原来在县文化馆工作，搞专业创作不到四年的时候，总理点点头，说：“在基层工作过，接触群众方便，容易熟悉群众，对文艺创作有好处。上来以后还要多到群众中去，脱离群众，没有源泉，你的生活，创作就枯竭了。”

——赵羽翔：《周总理和我们心连心》，《吉林文艺》1977年第2期。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我们随同总理的专列去苏州。在列车上又受到总理整整一个下午的亲切接见，总理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和我们谈路线，谈形势，谈文艺，也谈自己青年时代的曲折经历，十分平易，仿佛在和我们谈家常，我们也无拘无束地向总理倾吐自己的心愿。总理批评了文艺界的一些不良倾向，鼓励我们要搞好文艺革命，创作要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理说：有些人躲在象牙宫里，脑子里做着玫瑰梦，专写古人和死人。奉劝他们打破象牙之宫，到群众中去，多写些现实题材。……邓大姐也勉励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多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还送给刘川同志八个字：“勇于创造，善于修改。”

——沈西蒙：《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工农兵评论》

1978年第3期。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玛拉沁夫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去上海改写这部电影（《祖国啊，母亲》），他耳边回响着二十年前周总理对他的教导：“玛拉沁夫同志，希望你多写民族团结的作品啊！”《祖国啊，母亲》就是他遵照总理的教导，经过多年酝酿写成的。

——新华社记者：《盛开吧，蒙古民族之花》，《人民日报》

1978年1月28日。

总理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这段时间内，曾经多次、反复跟我们谈到用电影艺术反映大庆油田这个问题。……总理当时深知要一个导演深刻体现大庆精神不是一件容易事。在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总理就提出要导演到

大庆石油工人中间深入生活，先拍一部艺术性纪录片的任务。

……一个夜晚，……总理谈到反映大庆反映什么这个问题。他说：大庆好就好在它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另外有一个农业生产基地，生产搞得也不错，可是他们大盖楼馆亭台。大庆就不，现在还住着干打垒的土房子。工人从地底下取石油，家属在地面上种粮食，他们给国家提供了那么多石油，他们不伸手向国家要粮食。总理极其称赞地说：你们反映大庆，就要反映开始的石油大会战，头顶青天、脚踏荒原，在一片冰天雪地里，大庆工人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向地球要石油的那股顽强战斗精神。

——刘白羽：《伟大创业者》，《解放军报》1977年1月  
11日。

拍摄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光荣任务。……一九六五年一月的一个深夜，敬爱的周总理在工作了一天之后，指示我们摄制组到大庆去深入生活，先拍一部艺术性纪录片，尽快拿出来。周总理殷切叮嘱：广大人民只知道大庆拿下了大油田，还不知道大庆人是怎样工作的，尽快拍出一部艺术性纪录片来，就可以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什么叫大庆精神，看到大庆会战是怎么回事。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去了大庆，在大庆工委的领导和大庆职工的支持下进行工作。开始由于过分求全，提纲迟迟未能定稿。周总理批评我们“贻误战机”，同时又派了负责同志到大庆敦促我们，指示要以反映大会战披荆斩棘、艰苦创业

为主，不要面面俱到地搞油田发展史。

——张骏祥：《大庆会战凯歌冲云霄》，《人民电影》1977年第1期。

记得一九四八年，我们歌舞团的前身——群众剧社正在农村一边参加土改，一边演出《农民当家》等剧目。当时，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土改中，大搞“搬石头”，推行打击贫下中农及其干部的错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我们节目中。在邓颖超同志建议下，周总理刚从陕北战线过来不久，就同其他中央首长一起观看了我们演出。然后，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了话。从我们党的性质讲到文艺作品的典型化问题。周总理尖锐地指出，这个剧名就不确切，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怎么能片面地提出“农民当家”呢？周总理谆谆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天津市歌舞团：《人民的好总理 文艺战士想念您！》。  
《天津文艺》1977年第1期。

总理还对（老舍的话剧）《春华秋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还有两重性，不要因为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斗争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为此，总理专门约老舍和导演详谈了党在现阶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经过这次长谈，老舍明白了：以违法的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党的政策的全貌。正确的道路是：经过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打退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使他们愿意接受党和政府

的领导，在遵守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利用、改造他们。戏剧的结尾，总理指出：也不能因为又斗争又团结而以一团和气来结束全剧。戏的结尾要给“五反”运动下个结论，要写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来。老舍心悦诚服地接受总理这个意见，他把结尾又重写了六次，使《春华秋实》有了正确的政策性和完满的结尾。

——胡絜青：《周总理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人民戏剧》

1978年第2期

二、敬爱的周总理教导我们：文艺工作一定要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遵循毛主席的方针，周总理指出，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大力提倡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和流派的自由发展，提倡对文艺界各种学术问题展开自由争辩。并主张在文艺创作的题材选择上，既要以反映当代工农兵斗争生活为主，也要注意广泛和多样。他认为：凡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一定要与之进行斗争；但是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于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则必须慎重对待，反对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他主张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区别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思想问题，什么是习惯势力。

——文化部理论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人民日报》1977年5月24日。

周总理最反对“一言堂”。他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大力提倡“群言堂”，提倡民主作风。他曾严肃告诫某些专横武断的领导人不要学西楚霸王项羽，说：“如果有哪个想当霸王，必然要‘别姬’的”。他坚决主张在艺术的是非问题上要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在这方面，周总理自己总是以身作则。他在向文艺工作者作指示时，总是那样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每次作指示，总是声明他的讲话主要是想引起共同讨论，说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文化部理论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人民日报》1977年5月24日。

周总理既重视“五四”以来出现的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也重视传统的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对于丰富多采的戏曲艺术，周总理一贯热心扶持。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明确指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周总理的指示及时地挽救了一批在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下濒于灭亡的剧种。

——文化部理论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人民日报》1977年5月24日。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扶持昆曲这个有丰富传统的剧种。一九五六年四月，浙江昆苏曲剧团在北京演出重新整理的《十五贯》，获得巨大的成功。当时，毛主席曾三次观看了演出。周总理亲自参加文化部召开的《十五贯》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

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吴新雷：《论昆剧曲调的继承与创新》，《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总理又邀请了文艺界、戏剧界同志谈话，根据毛主席《矛盾论》的光辉思想，讲述了文艺工作应如何正确处理各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再次谈到了“两条腿走路”的精神，以便更好贯彻“双百”方针，鼓劲快上。周总理阐述了在政治上，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要和实际相结合；在工作上，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任务，又要留有余地；在业务学习上，既要有基本的技术训练，又要广泛的艺术素养；在创作上，既要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又要革命的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对作品的要求方面，既要有思想性，又要艺术性；在劳动锻炼上，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艺术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在生活待遇方面，既要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又要关心物质福利，等等。周总理强调指出：在“两条腿”当中，有一条是主要的，即对立统一的矛盾主要方面。周总理告诫大家，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变成‘一条腿’，否则就难免要跌交。周总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教导戏剧工作者避免片面性，树立全面观点。

——华焰：《不可磨灭的灿烂光辉》，《人民戏剧》1978年第1期。